

XIAO SHUO SHEN MEI TAN

# 小说审美谈

滕 云 著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 小说审美谈

NO SHUO SHEN MEI TAN

滕 云 著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

---

---

---

**小说审美谈**

滕云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 1/4 插页2 字数205,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

书号: 10151·901

定价: 2.95元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滕云是新时期崛起的著名评论家，多年来一直从事小说的审美研究。书中收集的二十余篇文章，都是从作者丰硕的研究成果中精选出来的。文章资料翔实、逻辑严密、论证准确，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创的艺术见解。

---

## 目 录

|                              |     |
|------------------------------|-----|
| “我们的艺术应该站得比现实更高” .....       | 1   |
| “写本质”与现实主义的深化 .....          | 11  |
| 多元化的典型观 .....                | 25  |
| 试谈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 .....          | 40  |
| 鲁迅小说艺术与《孔乙己》艺术成就 .....       | 54  |
| 试谈中篇小说的审美属性 .....            | 72  |
| 继承·借鉴·民族化 .....              | 89  |
| 《迷人的海》——《北方的河》 .....         | 108 |
| 新时期小说八年之断想 .....             | 121 |
| 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审美 .....            | 133 |
| 努力造成正常的文艺批评风气 .....          | 147 |
| 我所评论的就是我 .....               | 155 |
| 表现性格的完整性与丰富性                 |     |
| ——曹雪芹典型观初探 .....             | 166 |
| 《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客观性 .....          | 197 |
| 《红楼梦》的奴仆形象是充分现实主义的典型塑造 ..... | 227 |

## 一树千枝 一源万派

|                       |     |
|-----------------------|-----|
| ——《红楼梦》的叙述描写笔法·····   | 255 |
| 《红楼梦》文学语言论·····       | 300 |
| 《红楼梦》艺术技巧撷谈（二题）·····  | 334 |
| 重点与非重点·····           | 334 |
| 错里错 真外真·····          | 341 |
| 《三国演义》品评十题·····       | 349 |
| 话说华容道上的关羽·····        | 349 |
| 活泼泼的孔明·····           | 353 |
| 由孔明之胆说到罗贯中之胆·····     | 360 |
| 写马谡是为了写孔明吗？·····      | 364 |
| 张昭的反复·····            | 372 |
| 孙夫人的命运·····           | 378 |
| 从“两马相交，战不数合……”说起····· | 387 |
| “胜败乃兵家常事”之外·····      | 391 |
| 人物下场的艺术·····          | 394 |
| 盖棺而不封笔·····           | 398 |
| 给人物以显示性格的最好机会·····    | 404 |
| 世相、人情与人物·····         | 411 |

# “我们的艺术应该站得比现实更高”

——学习高尔基文学思想札记

## (一)

一九〇〇年初，高尔基给契诃夫写信，直率地认为，旧时代的现实主义已走到尽头了，它的力量、它的成就的高峰即将成为过去了，新的时代以及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的文学思潮来临了，“真的，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大家都希望有令人鼓舞的东西、开朗明快的东西，您知道，希望并不是酷似生活，而是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

高尔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回答时代和“大家”的希望。一八九五年，他写了《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一九〇一年写了《海燕》，呼唤无产阶级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一九〇六年写成开创无产阶级文学新时期的长篇小说《母亲》……高尔基的创作，反映了生活，但并不“酷似生活”，他非但不把生活的黑色、灰色作为自己作品的基调，而且他的作品所描写的比之革命运动的实际也更高、更好、更美，是使人鼓舞的、开朗明快的东西。

文学不能“恭顺地去服从”现实生活，不能仅仅满足于“酷似生活”，而应该“高于现实”，“站得比现实更高”，并且“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它提升到现实以上”

——这是高尔基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这样讲，这样做，几乎贯彻于他文学活动的全部历程。

为什么说“几乎”呢？因为十月革命前有一些时候，高尔基写了些受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影响的小说和论文；十月革命后有一些时候，正如列宁指出的，高尔基也一度“人为地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的境地，写出了“社会和平主义的呼吁书”之类的东西。在这些时候，高尔基没能“站得比现实更高”。列宁严肃而亲切地帮助他认识自己的偏向，对他说：“无论如何您绝不要”因为看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内部的某些问题而被“沉重心情压倒”，不要因为看到十月革命后的一些严重困难和问题而陷入“不健康的怨愤”情绪。列宁教育了高尔基，保护了高尔基。多年以后，高尔基回顾起来，还为此而对列宁怀着深深的尊敬和感激之情。一九三三年高尔基在一封信中，谈到当年他与列宁的“分歧”时说：“在现实生活知识方面我大概比他‘更有经验些’”，然而列宁的政治智慧、十分惊人的洞察力、从将来观看现在的稀有本领，使他“对俄国现实生活的了解却比我不知要深刻多少和清楚多少”。高尔基从这里悟出，一个作家仅仅满足于自己的“现实生活知识”和对生活的感性经验，是不行的，他应该站在高出于生活的观察点上，应该具备综观全局，“从将来观看现在”的本领。这种对生活的高瞻远瞩，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高尔基从自己亲身经历悟出的这个经验教训，作出的这个理论总结，值得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深思、记取。

## (二)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任务提上日



程。列宁发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要求苏维埃报刊“多谈些经济”，“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列宁又发表著名的文献《伟大的创举》，高度赞扬“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并号召：“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我们全体，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员等等都应该不倦地重复这个口号。”

高尔基接受了并且发挥了这个文学要同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的思想。一九二五年，当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水泥》刚发表时，他就写信给作者，热烈称赞作者第一个如此有力地抓住了“现代生活最有意义的主题——劳动”。此后，随着苏维埃国家大规模建设事业的展开，高尔基对文学的新主题、新题材、新人物的强调就更突出了。他反复说明，“年轻的文学”要“明白劳动诗化的必要性”（《一个读者的札记》），“我们应当选取劳动作为我们书中的主要英雄”（《苏联的文学》），“我们今日的英雄是学者、发明家、建设者、共青团员和少年先锋队员”（《谈谈〈诗人丛书〉》）……

列宁和高尔基的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显然易见的。我们的国家已进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那种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就是直接写四化的文学的看法当然是不对的。写不写四化与为不为四化服务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然而，新时期的文学，作为总体而言（不是作为个别作家个别作品而言，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决定写什么），如果直接写四化、写四化中的人与事的作品不多，质量不高，也很难说它已完全跟上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多谈些经济”，多注意“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抓住劳动这一“现代生活最有意义的主题”，应该是对

新时期文学的要求。我们的作家也应当积极深入四化建设中，从中挖掘和汲取创作的源泉和激情。我们的文学与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现实生活、新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应当以更多地表现为四化而斗争的新主题、新题材、新人物为主要标志。

### (三)

高尔基强调写建设、写劳动，写建设者、写劳动英雄。同时，他不赞同有些“青年文学家”“对生活抱着不正确的态度，他们的注意力大部分放在生活的坏的现象上面，好象看不出那些需要加以肯定、发展的现象”（《和青年作家谈话》）。高尔基自己对生活的观察是全面的。他说，“要知道，我们这里还有许许多多应该受到嘲笑、必须与之斗争的现象。但我们毕竟还有更多应该加以表扬的人物……需要歌颂，需要！”（《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高尔基指出了社会主义文学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新质：旧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历来把自己放在“世界和人们的裁判者”、“生活的批判者”的地位上，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不能只站在这个地位上（《苏联的文学》），“它的基本任务是借助于形象地描写劳动过程中的事实、人们以及人们的相互关系来肯定社会主义”（《给叶·谢·多宾》），以“激起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给亚·谢·谢尔巴科夫》）。

高尔基的意见是中肯的。他不反对暴露，他又强调歌颂。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文学的歌颂性与批判性的关系，是辩证的。他无论讲暴露与歌颂，都是站在高出于现实生活的立足点上的。不过，从苏联文学（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发展的史实看，他们却有偏于歌颂而忽视或排斥暴露、批判之弊。我们也有自

己的教训。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我们也是偏重歌颂而忽视或排斥暴露、批判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的批判性的职能得到了发扬，国家、民族的创伤及其后遗症，也可以“暴露”而引起疗治的注意了。我们的文学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的激情，体现了人民群众回顾和总结过去的严峻态度，从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共鸣。近一二年来，我们的文学则开始反映出人民群众想四化、干四化的创造的激情，体现出人民群众开阔胸襟、面向未来的昂扬神态，呈现出回顾过去的深沉思考与昂首阔步向前行动相结合、震聋发聩与鼓舞信心相交融这样一种新的思想艺术特色。高尔基说得对，我们的文学不只要做世界和人们的裁判者、生活的批判者，还要做世界和人们的鼓舞者、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的文学应该激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激起人们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而不应激起消极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

高尔基这些话，部分是对青年作家讲的。但是，这对我们也是有鉴诫作用的。二、三十年前，解放后的第一代青年作家，很多人以新生活的年轻歌手的姿态走上文坛；二、三十年后，又一代青年作家出现了，他们中不少人是唱着悲壮、辛辣的战歌走上文坛的。两代青年作家成长的不同道路，耐人思索。这是时代的玉成，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局限。我们今天这一代青年作家，是应该把生活的战歌与生活的颂歌的关系处理得更好的。

#### (四)

高尔基是一个“血液中充满着太阳”的人和作家。他不喜欢生活的阴霾遮没文学。他喜欢明朗、热烈、乐观、朝气蓬勃、

积极向上的东西，也喜欢这样的文学。这成了高尔基文学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特色。高尔基一贯强调、特别是他在十月革命后更加强调文学的英雄性、理想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应该提高音调”，“用更鲜明的色彩”“更崇高更适当的语调”来描写现实——这是高尔基的一点意见。

“现实主义”应该“能够不仅把人描写成现有的模样，而且描写成将来所应有和必然会有的模样”；“光描写现存的事物还不够，还必须记住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文学在描写过去和现在的现实的同时，还要描写将“列入我们的日常现象”的“第三种现实”即“未来的现实”——这是高尔基的又一点意见。

艺术的使命“在于上升到高于现实的地方，从新人类的始祖工人阶级所提出的那些美好目标的高处来观察当前的事情”和过去的事情——这是高尔基的再一点意见。

“应该寻找一种可能性，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成为第三种东西”——这是高尔基从上述三点意见归纳出的探索性的结论。

高尔基的这些探索，揭示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及其创作方法区别于以往一切文学及其创作方法的一些最基本的特质。高尔基这些著名的见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我国文艺界，曾经流行过脱离现实主义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的现实主义在迂回曲折的行进中历尽坎坷，在“四人帮”为祸时期更处于被扼杀的逆境。打倒“四人帮”后，我国文学涌

现出一股强大的、生机盎然的新的潮流。当它的潮头刚刚掀起的时候，曾被人指责为“暴露文学”、“批判现实主义”。这种指责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挡不住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文学新潮的去路。文学继续以其新的内容、新的形式（许多是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前所未见的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出现而显示着它的向前发展。有些作家和评论家在观察和认识这些新的文学现象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复兴。我个人认为，这样概括，似嫌笼统。实际上，当前的文学运动，更主要的应该说还是革命现实主义的运动；此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方法和技巧，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和技巧，某些近代和现代的外国文学方法和技巧，以至某些自然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和技巧，等等，在我国当前文学思潮中也存在着。无可讳言，目前人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的确比较纷杂，对社会主义文学需要什么样的创作方法的理解，也的确比较纷杂。我以为，值此之际，介绍高尔基的有关看法会有益处。

当然，人们对高尔基的这些看法的评价，是会不一致的。当高尔基说要“提高音调来表达现实的英雄气概”的时候，他是不是要搞人为的“英雄化”呢？不是。高尔基所指的，既包括“一个钟头的英雄主义”，更着重“一生一世的英雄主义”，即日常生活日常劳动中的英雄主义。这同列宁表扬“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完全一致。我们的文学在面对四化建设的时候，是否应当到生活中去发掘、去表现这种劳动创造的诗意、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英雄主义？我认为，应当的。象话剧《报春花》、短篇小说《西线轶事》、报告文学《大雁情》的作者，就是这样做的。那些女工、女兵、女科学工作者，都不是“高、大、全”式的假“英雄”，而是我们现实中的活生生的英雄。

这不是搞“英雄化”。因而在文学思想上也不应搞“非英雄化”。

也许有人会说，高尔基提倡“不仅把人描写成现有的模样，而且描写成将来所应有和必然会有的模样”，这不是提倡脱离现实、凭空虚构吗？高尔基预先就把他对这种非难的回答写给我们了：“这并不是说，我劝你们‘捏造’人物……我再重复一句：没有‘捏造’的必要，因为这些特征是真正存在着的”，“它的基础是劳动生活，它的原料是观察、比较和研究事实，归根结蒂是事实，事实！”（《谈手工艺》）。优秀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就是这样塑造的。乔厂长的那些特征，在生活中，在我们一些优秀的工业领导干部身上是或集中或分散地存在的，在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意愿中，乔厂长的模样是“现有的”，也是“应有和必然会有的”。作家们有权利、有责任这样塑造人物。生活要求这样，人民要求这样。

也许又有人会说，高尔基要求“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峰来观察”当前和过去，是忽视和回避现实的矛盾。不，高尔基反对“那些被现实所吓倒而逃避到幻想中去的人们的浪漫主义”。他希望作家“善于站在现实之上，敢于把现实看成原料，从不好的材料中创造出合乎愿望的很好的东西来”（《给费·华·革拉特珂夫》）。我们的文学是吃够了“被现实所吓倒而逃避到幻想中去”的“浪漫主义”的苦头的。粉碎“四人帮”以来这几年，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的文学敢于面对生活，反映生活的阴暗面和反面现象，揭示现实的矛盾以至一些很尖锐的矛盾了。今后，我们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做得更好。我们的文学一定不能回避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困难、艰苦性、牺牲、悲剧。同时，也应该指出，如果我们的作者只满足于揭

示现实的矛盾、阴暗面和反面现象，而不问如何揭示；如果我们的作者不是“站在现实之上”而是站在现实之下，不是把现实看作需要选择、加工的原料，不能“从不好的材料中创造出合乎愿望的很好的东西来”；如果我们的作者对正面现象不加旁顾，不努力发掘；如果我们的作者不能怀着崇高的信仰从未来的伟大目标观察现在和过去，那么，他们的作品就会脱离人民，从与人民的心贴近转而为与人民的心隔阂、疏远。因为人民固然不喜欢廉价的乐观主义，却是要求文学给我们以生活和创造的信心、力量，给我们以崇高理想、美好情操的教育与熏陶的。

按照高尔基的观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但自然主义方法，而且旧现实主义方法，对“全部复杂的真实”都是“没有能力去描绘的”，即使是在反映现实矛盾和“过去时代的卑鄙龌龊的真实”上能取得某种成功，却不能理解、不能描绘与“卑鄙龌龊的真实”作斗争并把它消灭掉的“正在成长着”的真实（《给华·谢·格罗斯曼》）。因此，我以为，高尔基寻找一种“介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创作方法，是完全合理的，是极其可贵的。无产阶级文学是否已找到了这种方法，我们应该如何去表述这种方法，我们还将如何去发展这种方法，这可以讨论，可以实践，不必加以限定。但是社会主义文学及其创作方法，是人类文学艺术优秀传统的批判继承，又是它的发展、革新，绝非传统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和其他“主义”）的挪用和翻版，这，却必须肯定。

我们今天不要含混地说复活现实主义吧。现在人们强调现实主义，是应当的；不过也应了解，现实主义不是从古至今一成不变的。从根本上说，我们应该做的，是按照时代的要求、

人民的愿望、文学的规律，探索我们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方法和道路。

（一九八〇、三）



## “写本质”与现实主义的深化

近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少数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出现了一些浮在生活表面的作品，有些严肃认真的作者，则在如何进一步开掘生活、更深刻地反映生活上，有这样那样的考虑和尝试，这都表明，实践已经提出了现实主义需要深化的问题。理论批评界有的同志提出，“‘写本质’作为一个创作口号，正是对‘写真实’、对现实主义的进一步深化”。我认为，这样的意见动机是好的，但“写本质”的口号在理论上、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上，确有可议之处，未足为防治现实主义浅化的药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武库里，有促进现实主义深化的更好的理论武器。

### —

“写本质”的口号不宜作为现实主义深化的口号，首先是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混淆文艺与科学的本质区别。“写本质”之说最基本的理论前提之一，是认为文艺与科学的区别仅在形式、方法，不在内容，文艺与科学在揭示生活的本质上，是共同的。有同志撰文，谓：“艺术不同于哲学，不在于它需要反映事物的本质，亦即它的内容不在规律，而在于反映的形式的